

政治經濟體制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王國斌* 著**

我很高興能針對中國史上政治經濟體制(political economy)研究的重要性撰寫一篇簡短評述。這個領域的主題，對於拓展我們對中國史的認識、將中國當前行事作風放到歷史與比較觀點上思考，以及更全面地修正我們對於改革政治經濟體制的期許，都將有重要的關連。

首先，我想呼籲各位考慮研究政治經濟體制對中國史的重要性。在歷史著述中，中國政府及其行動一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經濟史近年來已發展為中國史研究中頗有建樹的領域。為了更全面地理解經濟，探究國家行動對經濟的影響，便顯得非常重要。國家政策隨著帝國空間和時間的多樣性而有所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各地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也牽動國內外貿易。與此同時，儘管農業社會的生存焦慮在帝制中國時代始終存在，自宋代以降的經濟變化，既為中國帶來新的挑戰，也提供新的機遇。對中國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仔細的實證研究，可讓我們觀察實際運作中的各種制度，並讓我們得知歷史行動者所做的選擇究竟是依照何種行事規則。與其將焦點放在探究官僚體系

*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亞洲研究所教授

** 本文譯者張繼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的理想，抑或官員吏胥的弊端，政治經濟體制的研究反而更能闡明，日用平常的行動與例行公事造就了大部分的歷史經驗。制度性的各種規則，將一般性的規範轉而付諸實踐，讓那些受意識型態激發的信念得以化為行動。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諸種特質，讓我們可以用更寬廣的角度理解中國歷史。政府代理人以及經濟行動者的種種努力，使其雙雙成為影響中國歷史長期發展且具有能動性的歷史主體。

當我們結合自過去不同時刻所觀察而得的洞見，用以探究過去的實踐究竟可與晚近現象如何相關連時，這便明顯構成我們認真討論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歷史實例的第二個主要理由。此處僅舉一例：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 TVE)，並未依循任何一位經濟學家對現代貧窮國家所提出，在當時蔚為流行的明確發展計畫，而且也未曾複製歐洲歷史上成功發展國家的模式。相反地，我們卻能看到數百年來手工業曾經盛極一時的小鎮或村莊，在1980年代出現了小規模且勞力密集的工業。這些空間模型(spatial patterns)在兩方面展現了歷史上的前例(historical antecedents)：一是工業擴張主要並非藉由少數大城市的都市成長所帶動；二是這些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即已開創過生機盎然的商業經濟之地，通常也即是新近鄉鎮企業出現的區域。此種經濟擴張的另一項關鍵特徵，則是缺乏正式制度做為配套，諸如法律合約、律師、法庭和商業法，這些常被視為促成現代經濟成長的正式制度，在中國經濟成長的歷史實例裡卻都付之闕如。

即便中國並未建立那些有效協助經濟成長的正式制度，卻依然能創生高工業成長率，這便引發我們思考研究中國政治經濟體制何以如此重要的第三個原因。簡言之，歐洲史提供了許多政治經濟體制的基礎論述，諸如主張經濟發展要以正規制度取代非正規行動，如此才能更加確保安全而可以預期的經濟交易環境。若是在歷史長時段裡尋找一種趨勢，這些論述似乎言之成理；然而若試圖以此預測經濟成長如

何發生，其可行性便得再打折扣，因為這些論述無法辨識各式各樣足以創造經濟成長的實踐方式。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提供許多實例，說明透過各種非正式制度也可以擴張經濟活動，這些非正式制度在歷史上奠基於血緣與地緣，在當代則是基於中國共產黨引入各種社會與政治轉變所構成的其他網絡關係。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因而可以更全面地挑戰有關政治經濟體制的既有認識，讓我們再次反思，成功實踐經濟成長的各種模式，究竟是否能夠涵括於某一種在理論上具一致性的研究取徑，並以此解釋各種能在全球範圍內推進經濟發展的制度。

中國政治經濟體制這個主題，使史家可對影響未來整體情勢的特定行動，進行文化性的研究。制約人們追求經濟利益的政治建構確實非常重要。分析中國歷史上政策制定者的傾向與影響究竟如何影響經濟活動，是史家始終需要探索的重要議題。無論古今，經濟成敗都仰賴政府的作為或不作為。本期專號將受到歷史學者的歡迎，且必定啟發歷史研究，有助我們更為全面地認識當代處境。